中国传统工艺研究的深化与整合之路

The Course of Deepening and Integrating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Chinese Crafts

李晓岑 /LI Xiaocen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化遗产科学认知与保护研究基地，江苏南京，210044）
(Research Base for Scientific Cognition and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0044)

中图分类号：N09; C532　DOI: 10.15994/j.1000–0763.2026.12.008　CSTR: 32281.14.jdn.2026.12.008

科学技术史的“碎片化”已成为当前学术讨论的热点议题。张柏春提出其表现为缺少对科技知识体系的跨学科综合研究，给人一种“见木不见林”的印象，并从学科建制角度提出警惕特殊的“二级学科”弱化一级学科的风险。[1] 冯立昇指出研究对象零散化和琐碎化、研究方向越来越狭窄、研究成果分散不成体系，已成为困扰科技史学科发展的突出问题。[2] 这些批评反映了部分学科领域面临的困境。

然而，学术演进从来不是单一的线性轨迹。在科学史研究部分领域面临碎片化挑战的同时，一些特定领域正沿着知识的系统性汇集与重构稳步前行。中国传统工艺研究正是这一走向的典型代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通过大型文献编纂、数字化技术介入、学科理论建设和跨学科方法论创新，正在将传统工艺研究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系统化、整体化阶段。

一、从个案汇整到知识集成

科学史研究碎片化的一个核心表现是研究内容“分散不成体系”，个案研究的积累并未转化为整体性的知识框架。然而，通过几代学者数十年的集体努力，中国传统工艺研究以大型文献编纂工程方式实现了知识的系统集成。

《中国传统工艺全集》的编纂是这一进程的标志性成就。这项肇始于1996年的宏大学术工程，历时二十年，最终以20卷20册、1200万字、14000余幅图片和照片的体量问世，参与编撰的学者和工艺师达340余位，并以现代科技手段对实物和工艺流程进行了分析论证。比较而言，《考工记》著录6类30种工艺，《天工开物》著录6类115种技艺，而《中国传统工艺全集》涵盖传统工艺全部十四大类近600种工艺。正如常务副主编华觉明所言：“这部巨著在一定程度上，可认作是《考工记》和《天工开物》在当代补编和续编的一种尝试。”

与《中国传统工艺全集》相呼应，近年来多个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也在推进传统工艺知识的系统性编纂。《中国工艺美术全集》作为“新中国历史上首次系统编撰的大型工艺美术丛书”，由工信部牵头、多部门支持。《中国民间工艺集成》作为另一项国家级出版工程，正在全国各省推进编纂工作。

随着数字技术介入，近来各地正在大力推进传统工艺数据库建设，数字化手段实现分散技艺信息的关联与长期保护，为传统工艺的知识整合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上述各项学术工程，通过科学梳理和系统

收稿日期：2026年6月15日
作者简介：李晓岑（1964–）男，云南大理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化遗产科学认知与保护研究基地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史、传统工艺。Email: lixiaocenp@163.com

性编纂、跨门类比较分析以及对工艺人文内涵的探讨，实现了传统工艺知识的有机整合，有效回应了学科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

二、学科理论的体系建构

科学史研究碎片化的另一表现是“理论概括不足，丧失对科学发展宏大叙事的兴趣和整体把握历史趋势的能力”。[2]然而，传统工艺研究正在经历从技艺实践描述迈向学科理论的体系建构。

潘鲁生提出构建中国“手艺学”的学术命题，“对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属性和体系加以系统深入的探讨”，[3]这一主张具有求真的学术意义，将手工艺从单纯的“技艺描述”提升到了学科体系的高度，有助于进一步求解手艺传承、造物哲学等基本命题。马知遥等指出，传统工艺研究亟待进行视域拓展，“文化维度需从文化关系研究向文化实践研究拓展，以民众的主体实践为主线，深度解释工艺文化的动态演变过程。”[4]与此同时，传统工艺研究的理论视角也在不断拓展和深化，陶瓷烧制、金属工艺、丝绸纺织和手工造纸等论题，将传统工艺及理论研究从民俗志层面提升至参与中西文明交流、造纸术发明等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

在方法论层面，1987年，英国学者约翰·劳（John Law）在“技术与异质工程”（Technology and Heterogeneous Engineering）著名论文中，[5]将传统工艺视为“社会–技术综合体”进行跨学科分析，它突破了将工艺视为单纯技术操作的传统视角，认为任何技术实践都是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物质等多重异质性要素共同建构的动态网络，主张寻求物体、人造物和技术实践的内在关联。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人通过“栖居”与世界建立本真存在的关系，这为理解工艺制作不仅是“造物”，更是人与世界建立彼此意义关联提供了基础。李泽厚认为科技工艺构成社会的生存基础，也是人类作为本体存在的基础，并提出“工艺本体”的概念。[6]我们认为传统工艺的活态传承是一种“做中学”，获取直接经验，传递核心价值的重要途径。[7]从本质上看，这已触及经验论的“物人互融”“做与受”等实践维度的深层问题。

当前，学理探讨越来越深入，传统工艺研究正在形成一个合乎逻辑的理论体系，不再是零散知识或孤立案例的简单堆砌。

三、跨界融合的学术生态

科学史研究碎片化还表现在“缺少对科技知识体系的跨学科综合研究”。[1]然而，不同学科的学者在传统工艺找到了共同的学术关切，这一领域恰恰成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一个范例。

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来看，20世纪80年代，华觉明等学者就起草了《祖国传统工艺保护开发实施方案》，后来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传统工艺研究会，为团结这一领域的学者群体、推动深入研究提供了组织保障，也为后来《中国传统工艺全集》的编纂奠定了人才基础。

以学术会议为标志的多个学术平台的运行，促进了不同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例如，2024年6月在南京召开了“第十一届中国技术史与技术遗产论坛”，会议内容与传统工艺密切相关。来自44家单位的135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举行了81场学术报告，涉及传统工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科技考古、工业遗产等议题。

就学科建设本身而言，包括传统工艺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从实践层面走入大学本科教育的新阶段。2021年，教育部批准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本科专业，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2026年全国共有23所本科院校开设该专业。

这种跨界融合的学术生态环境，将技术史、工艺美术、设计学和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资源，整合到传统工艺研究的共同学术场域中，从而打破了学科壁垒，避免了学科孤立带来的碎片化。

四、碎片化论题的再审视

对中国传统工艺研究发展历程的考察，可得出以下基本判断：该领域不仅没有走向碎片化，反而呈现出鲜明的系统性和整合性发展态势：《中国传统工艺全集》等重大文献编纂工程实现了知识的系统汇集；传统工艺理论不断拓展和深化推进了学术话语的体系建构；跨学科融合为特征的学术生态打破了学科间的壁垒。这一系列发展表明，知识的整合与重构在科学技术史学科特定学术领域内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正在成为主导趋势。中国传统工艺研究的经验表明，当学界形成共识、具备组织化条件并善于使用技术手段时，所谓学科“碎片化”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参 考 文 献］

[1] 张柏春. 科学技术史学科在中国的碎片化趋势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6, 48（4）: 1–3.

[2] 冯立昇. 挑战与机遇：科学史研究的碎片化与知识的整合重构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6, 48（4）: 28–31.

[3] 潘鲁生. 关于构建中国“手艺学”的问题 [J]. 山东社会科学, 2011,（1）: 70–72.

[4] 马知遥、王明月. 当代中国传统工艺研究的视域拓展 [J].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3（4）: 376–382.

[5] Law, J. 'Technology and Heterogeneous Engineering: The Case of Portuguese Expansion'[A], Bijker, W. E., Hughes, T. P., Pinch, T. J. (Ed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C],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2, 105–127.

[6] 李泽厚. 哲学纲要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235.

[7] 李晓岑. 论传统工艺的传承及传承人的培养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3, 39（5）: 113–119.

［责任编辑　王大明　柯遵科］

（上接第 27 页）

此增加了对医史的理解与期待，这也促使更多的学者进入了医史领域。

所以，医史研究的多元化是学科发展的趋势，而因此带来的碎片化与工具化的隐忧，也是学界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近年以来，医史学界越来越意识到回归医学知识的重要性。医史研究可以多枝嫁接，但是树根不能变，这个树根就是医学知识。强调知识作为核心，并非要回到医学文献、理论研究的学术史的道路，而是要通过知识作为纽带联结起医史研究各个方向。除了知识本身在不同的语境下解读之外，知识生产与流通的背景、人群、机制，以及存贮方式与工具等等也是重要内容。这一知识史的角度打破了传统的内外史研究的疆域，为医学史重塑了边界，亦可回应“没有医学的医学史”的质疑。同时，保持了医学知识的核心，就是保留了对知识的追求，保留了学术研究求真的本性，自然就破解了将其单纯地视为教育工具的担心。

本世纪以来的医学史研究的多元转向与学术回归，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学科边界与学术功用的探索。如果保持开放性的同时，坚持医学知识之根本，医学史将从一个边界模糊的交叉地带，转变为一个内涵稳定，关切凝聚的重要学术领域。

［责任编辑　王大明　柯遵科］